

西欧极右翼政党崛起的社会基础分析

邵国明

(广州市委政法委, 510046)

摘要: 近年来, 西欧极右翼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从中长期看, 西欧极右翼政党的发展会从更深层次上对各国现有的政党格局产生冲击, 情况值得关注。西欧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根源。因此, 对西欧极右翼政党崛起的社会基础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并评估其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为制定正确的对欧政策与决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 西欧; 极右翼政党; 社会基础

中图分类号: D

文献标识码: A

多年来, 西欧极右翼政党(以下简称“极右翼政党”)是欧洲政坛的非主流政党, 或者说是“边缘政党”。但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极右翼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明显提升, 情况令人关注。

一、西欧极右翼政党近年状况分析

欧洲各国政党大都有着系统化的理论、行动和选举纲领, 但极右翼政党至今没有形成比较成型的思想、比较系统的理论纲领, 其共同特点是宣扬极端民族主义或排外主义, 维护本国或本地区的狭隘利益。如法国国民阵线主席勒庞最著名的口号是“法国是法国人的”, 提出要把非法移民送进“临时难民营”; 奥地利自由党前主席海德尔曾公开宣称不少纳粹分子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公然说: “对奥地利来说, 最好重建奥匈帝国, 那时, 奥地利将比欧洲联盟还要强大”; [1]英国国家党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完全由白种人组成的英国”; “德国国家民主党”在其纲领中公开主张: “反对外国移民, 反对双重国籍法”, 甚至提出“不应再背历史包袱, 应当恢复德国的历史领土”。根据建党理念、政治主张及实际活动的不同, 学术界将极右翼政党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新法西斯”党。这类政党的建党理念继承了法西斯衣钵, 由纳粹主义顽固分子组成, 在选举中得票率一直很低, 未能进入主流政治。其代表包括德国人民联盟、德国国家民主党、意大利全国联盟等。第二类是极右翼政党的主流派别。这类政党的政治主张中常含有排外、极端民族意识, 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已进入议会或拥有一定支持率。代表包括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比利时的弗拉芒集团、奥地利自由党等。第三类是新极右翼政党, 或称“民粹主义”政党。以国家、民族及平民利益为号召, 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 代表包括瑞士人民党、丹麦的人民党、荷兰的“富图恩名单”党等。

极右翼政党近年的变化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对现有政治格局造成影响。近年来, 极右翼政党的政治影响力呈扩大之势, 成为不少国家政治格局中的基本组成部分, 对传统政治平衡已造成一定影响, 90 年代初上台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欧洲中左政党近年纷纷下台, 改由中右政党执政。在法国、奥地利、瑞士、丹麦、荷兰等国, 形成了左、右、极右三足鼎立的状况。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和比利时的“弗莱芒集团”在议会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奥地利自由党在 1999 年 10 月议会选举中获得 26.9% 的选票, 成为第二大党并进入政府; [2]法国国民阵线主席勒庞在 2002 年的总统大选中进入第二轮投票, 并得到 18% 的选民支持, [3]有 470 多万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失业者、公务员投票支持勒庞; [4]荷兰富图恩名单党 2002 年 5 月在议会选举中取得 26 席议席, 成为荷兰第二大党; 去年 5 月, “英国国家党”十多年来第一次在地方议会选举中获得 3 个席位。[5]其次, 影响各国

政府政策。面对极右翼政党反移民主张，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应的政策，或减少移民，或削减移民所享受的生活福利，直接或间接损害了移民的利益，伤害了合法移民的感情，影响了社会稳定。面对极右翼政党反对欧洲一体化主张，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对保守的对外政策，间接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再次，导致社会不稳定。极右翼政党以“国家”和“民族”为幌子，散播反移民情绪，宣扬一体化和全球化将使各国的民族特色和文化特征成为牺牲品。表面上看，极右翼政党反对的是外来移民，实际上是宣扬“种族优劣论”，这种政治主张在曾深受纳粹主义严重祸害的欧洲传播是极其危险的。安东尼·吉登斯曾说：“新法西斯主义不是最初形式的法西斯主义，不论信奉它的人对过去抱有多大的怀旧情绪。它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充斥着潜在的暴力倾向”。^[6]事实上，极右翼势力的排外活动呈增加趋势，种族歧视刑事案件不断增加，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少数极右翼政党更与犯罪集团有染，如德国“国家民主党”的部分党员就是犯罪团伙成员，这种状况引起欧洲各国人民的普遍不安。

二、西欧极右翼政党崛起的社会基础

对极右翼政党崛起的原因，部分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一些研究理论。如“抗议理论”，该理论认为极右翼政党缺乏严肃的思想意识形态，其“支持者”表达的只是对主流政党的不满；“单一问题理论”，该理论强调反移民主张的吸引力及与此密切相联系的问题，解释为何工人阶级背景的选民会支持极右政党；“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该理论强调政治制度对极右翼政党的“开放性”。这些理论都在某个方面解释了极右翼政党在近年取得进展的原因。但单个理论并不能准确、综合地回答欧洲极右翼政党崛起的原因。如“抗议理论”难以解释极右翼政党近年来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左政党的传统选民的现象。“单一问题理论”难以解释一些移民不多的地方亦有强大的极右政党势力。事实上，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移民大量增加、社会福利制度面临危机、反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思潮扩大、政党政治留存的空间等等因素都是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崛起的社会基础。

（一）经济因素。经济发展缓滞是极右翼政党崛起的导火线。近 10 年来，欧盟各国在市场逐步统一的基础上，加快了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但由于受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社会改革迟缓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率一直比较低。1994 年，欧盟经济增长率只有 2.4%，1995 年为 3%，1997 年为 2.6%，1999 年为 2%，^[7]2000 年的 GDP 增长率为 2.8%。^[8]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使欧盟各国的高失业率、高税负、高债务等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如失业率一直高企，欧盟 1998 年的平均失业率为 10%，1999 年为 9.4%，失业人数达 1500 万，^[9]2002 年为 7.6%，^[10]。经济低迷无力支撑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这一矛盾直接导致公共开支与社会福利开支压缩，诱发治安、住房、社会福利等诸多社会问题，引起老百姓对政府政策的不满情绪，并对外来移民产生排斥感，形成排外主义的土壤。因此，当极右翼政党提出所谓的对策，如在经济问题上，主张用极端自由主义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主张取消最低保障工资，保护本国产品，反对加入欧盟等主张时，即使一些政策并不具备可行性，但仍吸引不少选民。

（二）移民因素。随着东欧局势变更和欧洲一体化进程深入，西欧国家的外来移民大量增加。据统计，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欧盟 15 国共有合法外国移民 1800 万，占欧盟国家总人口的 4.8%。^[11]到 2000 年底，移民已达 2000 万人，除了合法移民外，还有非法移民约 300 万。面对大量移民，欧盟各国加大了协调解决移民问题的工作力度。1999 年 11 月，欧盟芬兰坦佩雷会议决定把避难政策与移民政策纳入未来的“共同司法与安全空间”，后来还通过协同打击和遣返非法移民的行动计划。但由于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技术发展的需要，欧盟各国不得不吸收移民弥补劳动力的短缺，吸收技术发展急需的人才，移民不可避免增加，大规模的移民加剧了西欧各国已存在的社会问题，造成就业、治安、住房分配上的紧张。

另一方面，不少移民长期不融入当地社会，也加剧了西欧民众的担心。“少数民族的独立意识不断增强。他们不仅要求保留民族文化、传统、语言文字，而且还积极谋求更多的政治权利，甚至政治独立。这些行为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主流价值的放弃，甚至否定，以致于有人担心这种多元化主义会成为制造分裂的潜在因素”。^[12]因而，荷兰富图恩提出，伊斯兰移民必须接受荷兰的文化，否则，宽容的荷兰文化将被最不宽容的伊斯兰乡村文化所征服。奥地利自由党的党纲写着“我们反对各种文化的交融，它会造成社会的混乱”。不少西欧民众日益担心，移民不仅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现有的文化，

极右翼政党借此将移民和各种社会矛盾挂起钩来，提出不少具有排外主义和种族歧视色彩的政策、主张。法国国民阵线主张在住房、就业、社会救助等各项社会事务中给予法国人优先权，取消一切家庭团聚政策，取消外籍人士自动获得法国国籍的相关政策等。德国国家民主党和共和党公开主张“劳动位置应留给德国人”。这些主张得到不少利益受影响民众的支持。欧盟 2000 年的一次调查显示，66% 的公民承认自己“有些种族歧视心理”。而法国的一次调查亦显示，92% 的人认为法国普遍存在种族主义，2/3 的人自称有种族主义倾向，仅有 10% 的人表示可以与移民和睦相处。^[13]事实上，“种族或民族冲突向度的政治意义明显上升”。^[14]

（三）社会福利因素。西欧社会福利制度对社会的公平、稳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当福利开支超出国家经济承受能力时，危机就会出现。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欧各国不同程度地染上“福利病”，其中最典型的是“瑞典病”——“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即高福利、高税赋、高债务、低效率。目前，欧盟各国的社会福利开支不断增加，而且基于以下四个原因，社会保障费用还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还会加重：一是高失业率导致救助费用激增。由于产业结构发生调整、技术更新以及外来移民等因素影响，失业率不断上升，各国不得不增加失业救助，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二是人口结构变迁使社会保障费用增加。随着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改善，人的寿命不断延长，依赖社会保障收入生活的人口不断增加。据世界银行预测，到 2020 年，欧盟国家老年人口比例将比上世纪末增加 50%。^[15]三是人员流动带来额外经济负担。大量移民涌入造成住房、医疗、失业救济和技能培训等方面的额外负担。四是政治斗争使社会福利开支居高不下。执政党为争取各阶层选民对政府的支持，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来笼络民心，争取选票，各政党的轮流交替执政，使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居高不下，社会负担不断加重。为了削减过高的社会福利开支，减少财政赤字，欧盟各国纷纷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开源节流，增收节支。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对社会开支和福利开刀，影响了一部分老百姓的福利待遇，造成对执政党产生不满。问题是，西欧各国已经从传统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社会福利需求不断增加，且变得多样复杂，而可以运用的保障需求的资源却没有同步增加，社会保障体系的支付能力有限，国家调节经济的能力被削弱，形成恶性循环，社会保障问题一时难以解决。

在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上，还遇到移民的待遇问题。社会保障是主权国家的政府在疆界内实行社会保护政策和措施。在实施保障过程中，“国籍”（或居住权）是不可缺少的条件。现在市场虽然统一了，国家却不是一体。国家的经济主权让渡了，社会管理主权却仍在民族国家手中。大量移民能否享受同样的社会福利待遇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事实上，极右翼政党经常利用这个问题攻击执政党，宣传移民抢去本国国民的饭碗，分薄原先已紧缺的福利资源，制造矛盾以争取选民。

（四）欧洲一体化因素。由于极右翼政党群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理念与欧洲一体化格格不入。因此，极右翼政党对欧盟建立和扩大一直持反对和消极的态度，不少极右翼政党猛烈批评欧盟委员会，称它为集权机构，认为欧洲一体化将会取消各国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提出“要民族国家，不要欧洲联邦”。法国国民阵线主张退出马约，并呼吁通过全民公

决来决定是否重新使用法郎。“德国国家民主党”和“共和党”提出“不能拿德国的钱用于欧盟发展，保留马克，拒绝欧元”。由于传统左右翼主流政党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逐步趋同，这使部分怀疑和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民众把选票投向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极右翼政党。

欧盟是国家主权和职能让渡的产物，是一个超国家机构，各成员国要向欧盟转让主权，因此，民主、公平与制衡对欧盟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在民族国家依然是最牢固政治单位的情况下，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将要求各成员国转让更多的国家主权，对民族国家的权力与职能将会产生冲击。由于宣传不够，不少民众对欧盟的领导机构如何运转、如何决策知之甚少。西蒙·希克思在《欧盟研究：“新治理”议程及其竞争者》中指出“欧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关于它的民主和合法性的问题。欧盟已出现了‘民主赤字’，公众对欧盟发挥更大作用和拥有更多权力的忧虑甚至是抵触情绪，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民主性本质的不确定性。因为，目前人们所接受的民主理念是以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民众参与和多数主义为基础的，但欧盟明显地缺乏这些必要条件”。^[16]不少民众担心加入欧盟后会丧失国家主权，担心本国利益受到欧洲大国或欧盟的操纵，特别是芬兰、瑞典、挪威等小国民众担心欧盟被英法德意等几个大国垄断。如欧盟对奥地利极右翼政党自由党的制裁就引起一些小国民众的反感，认为制裁在某种程度上是欧盟大国所强加的，奥地利不少民众更认为制裁是针对奥地利和奥地利人民的。奥地利总理许塞尔就说：“假如奥地利不是一个小国，而是一个大国，反应则完全不同”。^[17]

此外，不少民众担心欧洲一体化进程会影响自身的就业机会、福利待遇。事实上，随着欧盟建立，不少国家政府为达到《马约》规定的通胀、赤字和利率趋同标准，为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采取了一些以牺牲劳动者社会保护来换取更好投资环境的政策，确实影响了部分民众的切身利益。特别是欧盟决定东扩后，不少民众担心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原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会拖累欧盟的经济发展，增加富国的负担，担心经济、文化、宗教的差异会把欧洲变成至少两个以上截然不同的实体。因此，当奥地利自由党前主席海德爾宣称东欧廉价劳动力会抢走奥地利人的饭碗时；当法国国民阵线的勒庞强调保护民族工业、保障国民就业，反对欧盟、反对全球化时；当丹麦人民党和挪威进步党怀疑欧盟和欧元会损害他们的民族特性、文化传统时，就迎合了一些担心欧洲一体化会损害国家利益、切身利益的民众的心理，他们感到极右翼政党道出了心声，因而转向支持极右翼政党。

（五）政党政治因素。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与近年政党意识形态、阶级结构、政党制度等因素的变化、影响有一定联系。

1、政党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随着东欧解体，冷战结束，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逐渐弱化和消失，发展本国经济，协调国内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各国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首要任务，民众的政治意识和心理不断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选民不是以政党分野和意识形态作为投票的取向标准，而是以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及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政党执政的政绩作为投票的选择依据。传统的左右翼政党不断对自身的一些较激进的做法进行改革与修正，日益变成兼容并蓄的政党(Catch-all)，政党意识形态与纲领的中间化趋势增强。而不少极右翼政党在坚持其固有核心理念的同时，也吸收一些主流政党的政策，提出一些顺应民意的主张。法国勒庞在竞选中称：“我的社会性为左，经济性为右，民族性为法国”。^[18]由于政党政治纲领越来越趋于一致，左右界限日渐模糊。各党候选人是选民爱听什么就说什么，造成不少选民认为反正谁上台都一样，因此有的选民抱着“都一样”的心态把选票投给极右翼政党。有的选民则认为现有的左右翼主流政党往往把精力放在政权斗争上，忽视经济、民生问题，加上频频曝光的政治腐败丑闻使传统左右翼主流政党的吸引力日益减弱，不少人借选举发泄对主流政党、执政党的不满，在选举中投“抗议票”。

2、阶级结构变化的影响。政党要取得执政地位，总要从特定的阶级阶层寻求支持。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左右翼传统党派不

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注意对传统政策作出调整，重构政党的选民基础，使本阶级本政党的利益与全社会的利益趋于一致，以最大限度地吸引选民，拓宽本党的社会基础。可以说，政治吸引力和政治支持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全面的变化。以“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为指导思想的英国工党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党在组织制度、政治纲领方面进行了大改革，致使党员结构成分变得复杂，鲜明的阶级功能已经逐渐消失，全民趋势明显，这种变化在西方主流政党中具有普遍性。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传统工人阶级的冲击最大。近年，第三产业发展迅猛，科技、管理、办公室等“白领”阶层不断扩大，形成了社会中间阶层。而西欧民众加入某种经济利益集团的人数远大于加入某一政党的人数。为了争取选民，左右翼传统主流政党逐步把注意力转向选民数量庞大的中间阶层和各种经济利益集团，以中间阶层、经济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作为制定判断政党政策的考虑重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原有传统选民的利益要求。不少工人感到原来代表本阶层利益的左翼政党已不能代表、维护其利益，认为“官方化的左翼理论所辩护的对象实际上从劳工转变成跨国资本和国家”，^[19]因而将选票投向包括极右翼政党在内的其他政党。如1986-1995年间，投票支持奥地利自由党的工人从10%上升到34%，在1999年的选举中，投票选海德尔的工人比例更上升到46%，海德尔甚至宣称，自由党已取代社会民主党，成为奥地利工人阶级利益的真正保卫者。^[20]同样，传统右翼政党向中间靠拢，不少原右翼政党选民对此转变亦感到不满，使极右翼政党有机会吸引部分原右翼选民。民众对传统政党的忠诚度降低已成不争的事实。

3、政党制度的影响。西欧现有的政党制度对极右翼政党参政具有“开放性”。在普选制度下，不管是主流政党还是非主流政党，只要获得选民的支持，都会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大部分极右翼政党已在各国政党制度下存在多年，并在政党参政规则下表达政治诉求，参与选举，甚至联合执政。近年来，在各种社会问题综合影响下，一些国家的政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该极右翼政党提供了突破机会。如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的全国联盟等能在选举中取得新突破，与该极右翼政党有一定关系。法国目前实行的是“半总统半议会”的多党制，近10年，总统与议会多数派分属不同党派成了政治常态，曾出现三次左右“共治”的局面，由于总统与议会多数派分属左右两翼政党，在执政中经常出现相互掣肘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执政效率和能力，造成部分选民不满，因而把选票投向包括国民阵线在内的其他党派。又如意大利实行的是议会制的多党制，由于政党林立，在议会上获得席位的政党通常有10多个，很难出现一党控制议会多数议席并单独组阁的局面，经常出现几个政党组成联合政府的情况。在此情况下，极右翼政党成了其他政党联合的对象。2001年，媒体大亨贝鲁斯科尼领导的力量党就和极右翼政党北方联盟、全国联盟组成同盟，赢得选举入主政府。而部分国家的选举制度也给极右翼政党创造了突破机会。以法国总统选举为例，法国总统是由选民通过两轮直接选举产生。第一轮选举中如果没有候选人得票过半，那么，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进行第二轮角逐，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由于对候选人资格的限制较宽，每次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少则八九人，多则十几人，去年大选更多达16位。候选人多势必使票源分散，所以，第一轮投票一般是选不出总统的，这种选举制度使法国总统选举成为选举变数很大的选举。勒庞在去年大选前险些因为凑不齐500个民选代表的支持而失去参选资格，在第一轮投票中只比总理若斯潘多20多万张选票，还不够一个百分点。^[21]

（六）自身建设因素。大部分极右翼政党已存在较长的时间，多年的经营已积累一定的民众支持率。近年来，为了参政、上台执政，不少极右翼政党加强了政党的自身建设，表现在：一是转变政党政策。不少极右翼政党在坚持其排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核心理念的基础上，注意顺应部分民众解决失业、移民、社会福利、政治腐败等问题的诉求，不断调整政策，提出一些大胆的经济、民生、社会政策，政策虽经不起推敲，但确实吸引了不少选民。二是加强组织领导。不断提高竞选策略水平和改进组织能力，如注意加强在街头、工人居住

区、公共场所的宣传，争取工人、失业者等各阶层选民的支持。针对党组织和党员的个人作用不断弱化，而政党领袖和少数政治精英作用增强的变化。极右翼政党花了不少心思把党魁设计成“明星”、“平民领袖”，在大选中争取各阶层选民的信任，几个引起关注的极右翼政党都有所谓的“魅力形”领袖，如勒庞、海德尔、富图恩等。三是加大宣传力度。除运用传统宣传方式以外，极右翼政党还大力搭建因特网平台宣传其极右翼政党理念、文化和思想，向民众大规模传播极右翼思想、政策、言论，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极右翼分子还经常利用因特网来攻击和破坏反极右翼的相关网站和网页。根据德国北威州宪法保卫局掌握的情况，互联网上从事极右宣传的网页从 2001 年的 800 个增加到 2002 年 4 月的 1300 个。比 1999 年增长近 4 倍。^[22]在德国，一些网址以“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万岁”作为名称，德国“民族联盟”在自己的网站上用 5 种欧洲语言宣传纳粹主义，不少极右翼网页还通过美国的网络服务器传送信息。可以说，因特网已经成为极右翼分子互相串联、动员和组织联合行动的重要手段。四是加强党际互助。极右翼政党逐渐改变过去各自为战的局面，加强相互联系。如在欧洲议会中互通声气，举行会议交流经验。德国人民联盟党魁弗来在 1993 年俄议会选举时以财力支持俄国自民党日里诺夫斯基参加竞选。法国国民阵线勒庞与俄、匈等国极右翼政党领导人亦加强了联系，并建议成立欧洲极端民族主义的“力量论坛”。这些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极右翼政党的政治影响力。

三、西欧极右翼政党受制约因素及其发展趋势

极右翼政党在西欧发展受到各方面的制约，这表现在：首先，西欧各国政府、主要政治势力、主流政党均反对极右翼势力。多数国家的左、右翼或中间政党基于自身的建党理念不同，为顺应大部分选民的政治取向，而拒绝与极右翼政党为伍。反对极右翼势力亦有广泛的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从法国大选第一轮结果出来后，全国有超过 300 个城镇、250 万人次上街游行示威，而希拉克在第二轮投票中的得票率亦高达 81.56%，创下法国第五共和国的选举纪录。在 2003 年 1 月进行的荷兰议会选举中，“富图恩名单”党的议席亦从 26 席跌至 8 席。^[23]

其次，西欧相对成熟的政党制度和法律体制对极右翼政党的发展发挥着有效的制约作用。不管那种选举制度，都是在选举中获得最多民众支持，取得最多席位的政党本身单独或负责联合组阁，或出任政府首脑。因此，一直以来只拥有少部分民众支持的极右翼政党很难成为执政党。另外，部分国家制定的一些选举规则亦对极右翼政党参政起着制约作用。德国在 1953 年制定的选举法中规定了政党只有在全国范围内获得 5% 的选票，才能进入联邦议院，并有资格参与比例分配议席，极右翼政党受入线规则的限制，一直徘徊在议会之外。

最后，极右翼政党的自身不足限制了本身发展。极右翼政党本身存在不足，如缺乏系统的理论纲领，事实上，一个政党政策主张缺乏坚实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难以在欧洲成为主流性政党的；又如政党组织系统分散，内部派系众多，尚未形成合力，在难以进行力量整合建立有效联盟和提出系统政纲的情况下，极右翼政党仍不足以左右政坛。

可以说，一方面，由于经济、移民、福利和对欧洲一体化的疑虑等问题在一段时期内无法也不可能得到完全解决，只要这些问题存在，极右翼政党就有继续存在、发展的土壤。在特定情势下，极右翼政党还会在个别国家有新的突破。从中长期看，西欧极右翼政党的发展将逐步从更深层次上对西欧各国现有的政党格局产生冲击。

另一方面，由于存在制约西欧极右翼政党发展的各种因素，各国政府、民众相继采取了一些限制极右翼政党、极右翼势力发展的措施。因此，极右翼政党的发展只局限于一定范围内，影响力尚不致于对西欧各国的内外政策产生根本影响，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取得的新发展并不意味着欧洲向极右方向转变，西欧极右翼政党还不至于改变欧洲政坛左右翼政党为主

的格局，主导欧洲政坛的仍然是传统左、右翼政党。这一趋势是与欧洲近年呈现的边缘政党地位上升、左右翼政党趋中发展，但原有政党格局未有根本改变的态势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 [1] 顾俊礼, 田德文. 福利国家论析——以欧洲为背景的比较研究 [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
- [2] 陶涛. 西欧社会党与欧洲一体化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3] 杨雪冬. 全球化: 西方理论前沿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4] 周淑真. 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5] 李巍, 王学玉. 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 [6] 胡瑾, 王学玉. 发展中的欧洲联盟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 [7] 陈志强, 关信平. 欧洲联盟的政治与社会研究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 [8] 林勋健. 西方政党是如何执政的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 [9] 白英瑞. 欧盟: 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
- [1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 全球民族问题大聚焦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1.
- [11] 刘玉萼, 石永义. 西方政治制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 [12] [英] 安东尼·吉登斯.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 [M]. 李惠斌、杨雪冬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13] 傅金铨, 张先义, 沈桂萍. 国外主要国家政党政治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1.
- [14] 卮庆治. 多重管治视角下的欧洲联盟政治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The analysis for Social Base of the rising of Extreme Right-wing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SHAO Guo-ming

(Politics Department of Guangzhou Commission of Politics and Law, Guangzhou 51004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fluences of extreme right-wing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in national political lives are gradually enlarged. In a long term, the development of extreme right-wing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will impact the present political structure of every country more thoroughly and profoundly. The development deserves a good deal of attention. The growth of extreme right-wing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comes with profoundly origin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history. So,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analyze the social bases, research and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the extreme right wing parties. These will provide gist for making the right policies in relations with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Key words: Western Europe; Extreme Right-wing Parties; Social Base

收稿日期: 2003-09-16

作者简介: 邵国明, 中共广州市委政法委政治处副主任; 法学硕士。电子信箱: shaogm2@21cn.com

-
- [1] 美联社维也纳 1994 年 12 月 26 日英文电讯，转引自陶涛：《西方社会党与欧洲一体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6 页。
- [2] 杨汝生：《奥地利极右翼政党入阁惊煞欧洲》，载《人民论坛》，2000 年第 3 期。
- [3] 孙恪勤：《欧洲极右势力为何屡屡抬头？》，载《求是杂志》，2002 年第 14 期。
- [4] 《勒庞现象与欧洲政坛的极右风潮》，载《青年参考》，2002 年 5 月 10 日。
- [5] 《英选民声讨极右势力在地方选举中抬头》，人民网，2002 年 5 月 5 日讯。
- [6] 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4 页。
- [7] 白英瑞等著：《欧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 页。
- [8] 陶涛：《“新经济”对欧盟经济增长的贡献》，《世界经济》，2001 年第 12 期。
- [9] 白英瑞等著：《欧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 页。
- [10] 《如何看待 4.5% 的失业率》，载《羊城晚报》，A2 版，2003 年 3 月 6 日。
- [1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著：《全球民族问题大聚焦》，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3 页。
- [12] 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3 页。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3 页。
- [13] 孙恪勤：《欧洲极右势力为何屡屡抬头？》。
- [14] 郇庆治著：《多重管治视角下的欧洲联盟政治》，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9 页。
- [15] 顾俊礼、田德文：《福利国家论析——以欧洲为背景的比较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 页。
- [16] 李巍、王学玉：《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历史文献选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7 页。
- [17] 杨汝生：《奥地利极右翼政党入阁惊煞欧洲》，《人民论坛》，2000 年第 3 期。
- [18] 《勒庞出言显出希特勒阴影，法抗议浪潮高涨》，新华网，2002 年 4 月 25 日。
- [19] 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58 页。
- [20] 张世鹏：《从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渗透看西欧政治思潮的基本发展趋势》，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 年第 3 期。
- [21] 刘玉蓁、石永义编著：《西方政治制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4-135 页。
- [22] 《德国互联网极右宣传网页剧增令人忧虑》，新华网，2002 年 4 月 5 日。
- [23] 《荷兰大选：执政党弱势胜出》，《南方都市报》，B27 版，2003 年 1 月 24 日。